



蓝色东欧
第3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路边狗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著

赵玮婷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Czesław Miłosz

PIESEK

PRZYDROZNY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PIESEK PRZYDROZNY

路边狗

Czesław Miłosz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著

赵玮婷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路边狗 / (波)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 赵玮婷译

.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1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360-7955-7

I. ①路… II. ①切… ②赵…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253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3-180 号

PIESEK PRZYDROZNY

Copyright © 1997, Czeslaw Milosz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欧阳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路边狗

LU BIAN GO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25 2 插页

字 数 106,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路边狗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只言片语， 包罗万象

(中译本前言)

赵玮婷

“我担心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这本书。”这句话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一九九八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时他刚凭借《路边狗》一书获得了波兰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项——尼刻奖。

《米沃什词典》的译者之一西川曾在《译者导言：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中提到，米沃什的作品中有一种可称为“封闭性”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他们的作品具有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的特征；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米沃什的文字总是离不开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维尔诺、波兰语、天主教这几个主

题，过多的典故、地名、人名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除此之外，这些文字并不好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作者本人一方面渴望共鸣，一方面又保持距离。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到底能不能百分之百地用文字呈现出来？米沃什曾说：“写‘我’的诗和‘歌颂上帝和英雄’的诗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描述的对象都被神话化了。”另一方面，写出来的文字又有多少能被接受和理解？对此他也一直抱有怀疑：“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诗人知道他们眼中的自己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这一点在他死后也不会改变，他的魂魄没法从另一个世界发出信息以纠正人们的误解。”然而，明知写出来是徒劳，米沃什仍希望被理解，但又不愿表露得过于直白，于是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读者，也与自己。

二

初读这本书时我确实觉得难懂，一是因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历史经历的角度来说，我与作者都不对等；二是书中第一部分的文章类似小品文，形式上短小精悍，语言上内敛含蓄，有的篇章还具有鲜明的私人性——或是内心的独白，或是梦境的记录，或是久远的回忆，又或是一段摘抄，几篇尘封的草稿。如果把读书的过程比作登山，那么以上两点的确增加了路途的艰难，但登顶后便会有鸟瞰迷宫般的豁然开朗，继而发现那些需要费点脑筋琢磨的地方正是阅读中最珍贵的地方。

诚然，这是一本难懂的书，但也确是一本有趣的书，只是需要多点专心，多点耐心。米沃什说：“我写作时，并没有想故意写得深奥难懂，也不认为自己的书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但我也绝对没想过要迎合大众的口味。我设想我是写给与我相似的人看的，我把他们当作朋友。”

波兰标志出版社于一九九七年首次出版了米沃什的《路边狗》，同年问世的另一本书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米沃什词典》。这两本

书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它们都采用了一种“高密度、大容量”的文体，将很大的信息量浓缩在短小精悍的文字之中。米沃什曾说：“我一直在尝试写一种‘言简意赅’的文体，比如《路边狗》里的散文，它没有什么诗歌性，更多的是平铺直叙，换句话说，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最精炼的话。我在写这本书时运用了这种技巧，在写《米沃什词典》时也是。我希望读者可以翻开书，读一页，然后合上书，以后再读。”波兰标志出版社主编耶日·伊尔格把《路边狗》形容为“有趣的杂烩，私人的疯狂”。我认为这话说对了一半。书中每篇文章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解释，相互铺垫；它是一锅杂烩，却不止是私人的。对诗人身份的剖析，对人与艺术关系的解释，对宗教的信与疑，对哲学问题的探究，对人性的揭露，对感怀之时的记录——哪一个不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话题？

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能把最常见的话题写得有新意，使之没有沦为老生常谈。从中可以窥见其非同一般的洞察力。这不仅是因为米沃什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动荡，还因为他的民族和文化归属一直都是个复杂的问题。

三

可以说，米沃什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他的生平应当从以下几件事说起：一九一一年出生于立陶宛的谢泰伊涅，幼年生活在老式贵族庭院中，受家族影响学习波兰语，在波兰语学校上学。少年时期，他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一九二九年他在维尔诺开始了大学生涯，于一九三三年取得了法律硕士学位。一九四〇年苏联红军占领维尔诺，他逃亡到纳粹占领下的华沙，其间积极参与了地下文学和戏剧的活动。一九四六年起，他先后在波兰驻纽约、华盛顿和巴黎使馆工作过。一九五一年他与人民波兰政府决裂，流亡法国。一九六〇年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他前往美国讲授斯拉夫文学，直到退休。他见证了极权主义的产生和扩张、苏联的解体。一九八九年他回

到波兰，居住在克拉科夫，直至生命的终点。他曾被视作“叛国者”，虽然被禁止在波兰出版作品，却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一九八〇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立陶宛、波兰、巴黎、美国，都或多或少对米沃什产生了影响。维尔诺被他视作故乡，波兰语被他视作母语，一生中最穷困的日子他在巴黎度过，选择去美国则被他称作无奈之举。因此他总是被迫站在“旁观”的角度，用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一切，从而领悟了何谓宽容，何谓与“不同”共存。米沃什在一次采访中说，在几个他曾生活过的城市里，最要感谢的是维尔诺，不仅因为他在那儿的中学和大学获得了良好的教育，还因为这座“多民族”的城市令他学会了对不同的文化的包容。在那里，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可以毗邻，基督教信仰与古老的多神教传统可以共存，战前的维尔诺还保留着对浪漫主义的崇拜，追忆着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的荣耀，怀念着密茨凯维奇笔下的山谷、田野与庭院，这些无疑都留在了米沃什的记忆之中。诚然，一生漂泊的境遇无时无刻不让他体会到孤独，但同时也馈赠他以难得的距离感，令他能够随时随地保持清醒和冷静。米沃什评价自己为“反叛的人”。正是反叛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人能够脱离“集体无意识”，可以试图——无论成功与否——去寻找事物真正的逻辑所在。

四

这本书中收录的散文、诗歌、杂文、随笔等都是米沃什年逾八旬后陆续在期刊上发表的。通过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一位学富五车的老师，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一位探寻真理的哲人。字里行间不仅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还流露出不加掩饰的真情。比如得到认同的欣喜：

我就是那么喜欢您，先生，超级感谢您写的诗《有关罂粟

的预言》和《这么少》（我很喜欢它们，我的猫也是）。

——《托伦市八岁的阿霞》

比如壮心未已的自我勉励：

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辈子都献给精神上的事，耄耋之年仍热情不减，并将这种态度保持至生命终点的人。

——《楷模》

比如看见一朵花重生的喜悦：

其实根本没这么难。

上帝创造了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创造日》

本书翻译自波兰标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波兰语原著，略有删节。

作为一个经验尚浅的译者，能翻译如此有分量的作品，我感到极其荣幸而又战战兢兢。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赵刚院长的推荐以及对译文的指正，感谢北外波兰语教研室专家安杰伊·鲁舍尔博士、爱娃·鲁特科夫斯卡博士在原文理解方面给予的指导，感谢“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老师、策划朱燕玲老师、孙虹老师的信任。在此一并感谢在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师长、同学和朋友。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定稿于北京

我思故我在：这是确实的，因为是不可能的。

——本杰明·方丹曾经写过他与列夫·舍斯托夫的谈话，书中提到，舍斯托夫曾这样改写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也许是真理的天然属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变为不可能，而无论如何都必须通过文字这种媒介。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自己的真理，但为了与其他人类同胞联系，他必须放弃真理，接受任何一个人们约定俗成的谎言。

——列夫·舍斯托夫《倒数第二句话》（1911年）。